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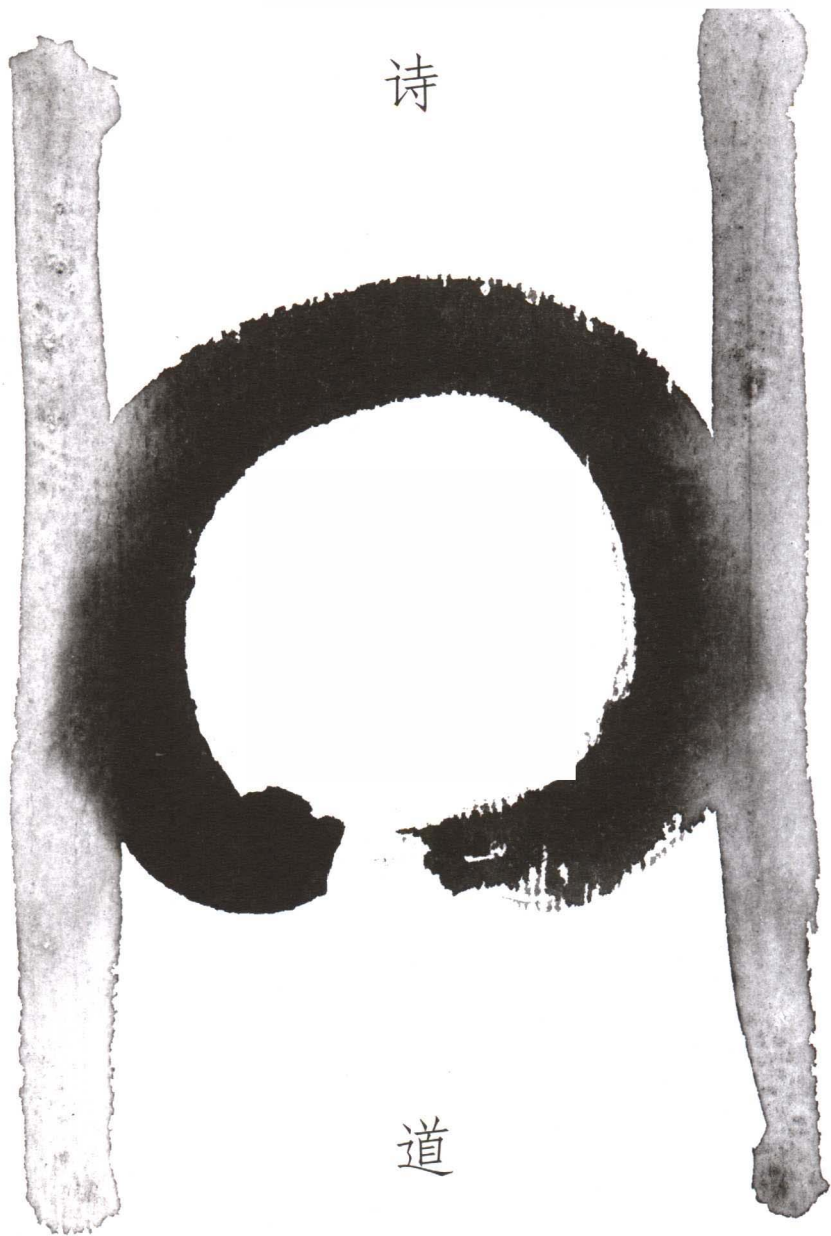
思者文库

诗道

陆凌霄 著
民族出版社



诗



道

陆凌霄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道/陆凌霄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思者文库)

ISBN 7-105-04654-6

I. 诗… II. 陆…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②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28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64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1.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思者文库》序

费孝通

《思者文库》序

差不多七十年前，我从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毕业，准备去英国留学。在导师吴文藻和史禄国的帮助下，我和新婚不久的妻子王同惠决定先到广西做调查，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第一次田野工作。我们在大瑶山里走村串寨，同惠做社会人类学的访谈，我做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大瑶山的生活很艰苦，我们却感觉非常快乐。同惠当时说：“我们出去了会追慕现在的生活的”。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我误陷虎阱，负了重伤，动弹不得，同惠外出觅援，一去不归，七天后才于山涧找到她的遗体。大瑶山的调查，一死一伤，同惠永远留在了广西。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广西和瑶山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我和同惠合著了《花蓝瑶社会组织》，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第一部田野调查报告，也把我和广西永远联系在一起。

从1978年以来，我已经数次访问广西和大瑶山，一直关注着那里的变化。最近，民族出版社的黄显辟先生，请我为广西民族学院老师们的学术丛书《思者文库》作序。我身体欠安，封笔已久，因为我和广西的特殊感情，更希望看到一批有才华的少数民族学者的成长和新世纪民族学术研究的发展，因而难以推却。我没有精力细看这套书的内容，听编辑部的同志介绍，这是一批被广西文坛称之为“相思湖作家群”的力作和广西民族学院推荐

的学术专著,水平不低。

《思者文库》重在一个“思”字,鼓励思想的独创性。这套书主张“读有所思,思而后说,说之有理”,我是赞同这一提法的。还应加上一条,就是要密切关注广西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现状,从现实的生活中汲取营养。记得当年我从北京到达大瑶山,路上用了两个来月时间,然后就靠两条腿跋山涉水。对比今天的变化,恍如隔世。现在的学者做调查研究工作,条件便利多了,要做得更加扎实。广西是西部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它的现状和未来都值得学人们关注和思考。

后生可喜,我鼓励他们在思考中创新,在创新中进步!

2004年9月20日

序

禹克坤

序

陆凌霄君生长在有歌海之称的桂西南壮乡，自幼就对诗歌有着天然的爱好的，进入大学深造，特别是毕业后到广西民族学院任教，长期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诗学的研究，思考与探讨了中国诗歌发展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放在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他多年来刻苦钻研的结晶。

这部《诗道》由两个相关的研究课题组成：一是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从宏观角度，综论我国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有学术意义的基本问题，如诗歌的本质和特征、中国诗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诗歌创作的主流意识和最高境界、诗歌的意境和韵味、古代诗法、诗坛领袖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以及诗歌发展的根本动力等，纵横恣肆，高屋建瓴。二是有关中国新诗发展的研究，这是更为引人注意的问题。凌霄君针对当前新诗发展的现状，别具慧眼，深入地探讨了诗歌写作教学的缺位对新诗发展的影响、新诗品味下降的原因及对策、新诗的定位、创作的道路等对目前新诗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他不仅仅停留于学理的探讨，还根据实地的问卷调查，具体诗作的解剖，提出了改进新诗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对策，这对于当前诗界是颇有借鉴价值的。附录中的文章，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对数篇学术界尚有争议的古典诗作及一些诗学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虽属散金

碎银，却是新意迭见。

本书在研究古代诗歌的基础上进而研究了当前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它表现了凌霄君学术上的创新与勇气。这种创新就是研究中国古典诗学紧密结合新诗的现状，细读书中各章可以看到他是从新诗发展现状来反思中国古典诗学，又力求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寻求新诗的借鉴，所以，在有关古典诗学的各章中处处能见到新诗的影子，在有关新诗发展的篇章中又常常见到古典诗学的闪光。浑然一体，意脉贯通。

20 世纪末，学术界曾经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许多学者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在我看来，要成功地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既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文学观念改造古代文论，也不能完全排斥西方，更不能只是简单地在古代文论的圈子里发掘现代化的宝藏，关键是要将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具体到诗，就是要将中国古典诗学与中国新诗创作结合起来，要从新诗创作的现状来阐述古典诗学，而对古典诗学的阐述又能说明与解决新诗发展的一些问题，大处着眼，细处着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做下去，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逐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如此，在新的世纪，中国诗学就一定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单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凌霄君的这部著作，其中的思路和见解，以至其中所洋溢的学术激情是值得一切关注中国诗学、关注中国新诗发展的朋友们重视的。

作为多年来在一起切磋诗艺的师长与学友，我为凌霄君在学术上的成就感到高兴，在祝贺他的诗学研究著作面世的同时，也期待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做更大的开拓。

2003 年 12 月 北京

关于中国诗歌发展问题的总结与思考

——评陆凌霄同志的《诗道》

黄素芬

中国古代诗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有很多规律和经验值得总结。从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问世起,古代的学者们开始认识并总结诗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培养国民素质的作用,他们把《诗经》看做是安身立命、治国经邦的百科全书。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把学习《诗》放在学科教育的首位,积极推行诗教,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并且指出了诗教的多种社会功能,把学诗看做是培养素质、增长知识和才干的重要途径。他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论语·阳货》)

在《礼记》中,则进一步把诗教提高到培养国民整体素质的高度来认识:“人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诗教也。”诗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儒家思想有多深,诗教的影响就有多深。秦汉以来,历代都有学者对《诗经》进行传、笺、注、释的工作,把诗的“六义”,不断发扬推广,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诗人,屈原、曹操父子、李白、杜甫、白居易、苏

轼、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他们以自己的诗篇，抒写爱国爱民情怀，表达对理想的追求，揭露和讽刺剥削阶级的暴行，同情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的呼声，从而使诗教的内容日益丰富，也使诗教的推行更趋于活跃。可惜的是“五四”运动的烈火，在烧掉了许多封建糟粕的同时，也烧掉了古代文明的部分精华，把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丢掉了，正所谓“把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了”。尤为严重的是在十年浩劫期间，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下，人们连专业书籍都不敢读，更何况要做诗词！于是便出现了如今诗坛的状况：许多年轻人对古典格律诗不会读、不会写，不会欣赏，新诗又太直白张扬，无诗味可言。我国的新诗坛面临着新旧诗歌之间如何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如何才能创造出像唐宋那样诗歌繁荣的局面，是摆在新诗人和诗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综观陆凌霄同志的《诗道》，既从纵向深入论述了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又从横向对我国诗歌的特征、艺术高度、技法等做出总结性的评述。在这基础上，对当今诗坛进行了认真的剖析，提出了积极的对策，这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陆凌霄同志广泛阅读，在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辩证的观点，对浩繁的材料甄别取舍，深入思考，缜密构思，较为切实地，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本质特征、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以及诗法、意境和韵味等，其中有许多新意和精彩的论述。

第一，对诗“言志”、“言情”之说进行了中肯的论述，并对诗歌的定义重新做了界定。他认为，在古代所述的定义中，不论是“诗言志”或“诗道性情”，都只是侧重于诗歌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并不包括诗歌的外部特征即诗体特征，所以还不能算是关于诗歌的完整的定义。的确，无论“言志”、“言情”，都是就诗的内容

而言,以此作为诗的定义,确实是不完整的,而后来对诗歌所下的定义中,通常认为诗歌是语言凝练、分行、有韵的文体,则又是偏重于形式了。《诗道》认为:

诗是用优美的韵律、和谐凝练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来表达人类的意志、愿望和情感,并且最具有韵味的一种文学。

这样界定,既有内容方面的要求,又有形式方面的特征,就显得比较完整。而《诗道》对中国诗歌的主体风格、韵味、语言特色、诗法等论述,尤其翔实而富有新意,这对于远离传统的新诗坛,是有启发的。

第二,《诗道》谈到“佛境对诗境的影响”(见第七章第三节),论述相当透彻和精辟。中国古代诗人谈经、礼佛、参禅,诗人与僧人交往很普遍,魏晋以来也有不少诗僧,可见佛教对我国古代诗歌影响很大,但论者多侧重于禅,而佛的境界如何,它对诗歌有什么影响,学界却谈得比较少。陆凌霄同志在这方面是很有心得的,他说:

我认为佛教对于诗歌的最大最根本的影响,是为诗人们打开了一扇他们一直想要打开却始终没能够打开的人生境界的大门,从这里窥见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点目前许多研究诗歌与佛教关系的学者似乎都不太注意。

他这里所说的“全新的世界”就是佛的境界,他认为佛的境界对人们有两方面的启示:

启示一:人生可以有极高的境界,在这高境界的人生中,物质生活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精神生活则上升

到主要地位。启示二：人的精神生命是不可穷尽的，人的潜力也是无穷的，只要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和不懈努力，就能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获得完全的自由。

诗的意境，是诗人对客观取境和主观构思而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诗歌的艺术境界。这原是以现实为基础又超越现实，美化了的理想而又不离实际的一种经过净化了的艺术境界。在上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作者认为佛的境界可以启发诗人向崇高理想的方面去努力，使思想得到净化，得到升华，以便创造出超凡脱俗的诗的优美境界。这和中国人所谓“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哲理，不谋而合，故能深入人心而影响至深。

第三，弘扬中国诗歌的民族精神。在《诗道》第三章第五节中，论中国诗歌中蕴涵的民族精神时说：

中国诗歌中蕴涵的民族精神，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关怀，以及蕴涵在人文山水中的人格精神。中华民族不但富于理想，而且一直在为理想的实现而不懈奋斗。中国诗歌中所蕴涵的民族精神，是我国文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形成和发展，加速了中华民族文明的进程，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加以继承和发展的。

这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在此之前，作者在论述中国诗歌的民族精神中，从先秦诗歌对乐土的向往，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到延安诗歌对新中国的向往和歌颂，无不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作者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诗歌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历史的忠实记录，是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和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的集中反映，是激发中华各族儿女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强大精神力量。”认为“延安的诗风，是前所未有的清新的诗风，为后来的新中国诗歌所继承”。而郭小川、白桦、闻捷、严阵、邵燕祥等人的诗歌，“像一支支嘹亮的号角，鼓舞人民投身火热的生活，激励人们，‘为幸福的生活来战斗’，‘去建设共产主义的高楼’”，而更为振奋人心，把民族精神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界的是毛泽东的诗词。作者在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之后总结道：“可以说，这是中国诗歌最为宝贵的民族精神，也是加强新诗精神建设中最需要加以认真总结，最需要很好地加以继承的部分。”

应该看到，这是作者对从古代到现当代中国诗歌的民族精神的论述和总结，作者的意图是明显的：在任何时候，中国诗歌的民族精神都不能丢失。没有民族精神的诗歌，是失去了灵魂的诗歌。

第四，对当今诗坛的忧思。作者以对我国诗歌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察和总结，深刻认识到诗歌写作教学对诗歌发展的重要影响，《诗道》指出，当今诗坛的不景气，是由教育界对诗歌写作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长期中断了诗歌写作训练造成的。他说：

中小学教学大纲中对记叙文(含散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等的写作训练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唯独对诗歌却一反语文教学的传统，只有阅读而没有写作训练的要求。这反映了教育界并没有认识到诗歌写作对于青少年心智健康的重要作用，没有认识到学习写作诗歌能够帮助青少年更好地确立人生观，可以培养青少年敏锐的观察力，以为只要读了诗就可以陶冶情操，是否会写诗无关紧要，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诗歌写作教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诗人，而是让学生的品格得到更好的培养，使学生运用祖

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得到增强,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

诗歌教学之所以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因为教育学生写作诗歌的训练,是提高综合素质和培养综合技能的工程。古人强调要想把诗写好,必须具备“史笔、才学、技能”和语言、手法的综合运用。陆凌霄同志提出“我国诗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有待于诗歌写作训练制度的恢复”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他说:

诗歌写作技能首先是通过教育获得,我国诗歌得以长期兴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得益于从西周以来在学校教育中所实行的诗歌写作教学训练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使国民从少儿时期起就开始熟悉诗歌并且逐步掌握做诗的基本技能,也培养了国民对诗歌的兴趣和爱好。

这和当前中华诗词学会提出“诗词进校园”、提倡“诗教”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诗歌教学缺位,诗艺失传,许多青年学生虽然向往毛泽东主席那种气壮山河、震烁今古的诗篇,但不得其门而入,而对新体诗又感到太直白,在这彷徨之际,那些粗口诗歌便乘虚而入,特别是由于学生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训练和传承,很难能够像古代诗人那样随口就吟出优雅的诗歌,表现出高度的文化修养。《诗道》的认识是正确而且具现实意义的。书中论及升学考试的导向关系到诗歌的兴衰,认为只有升学考试重视并涉及诗歌写作,才能带动学校的诗歌写作教学。同时,教师到位也是重要的一环。要培养学生,必先有师资队伍,这是至理。《诗道》中说得好:

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中之所以一直都不提诗歌写

作,恐怕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语文教师都不会写诗,而“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的说明,表面上是限制考生,真正的原因是语文教师有很多人不会做诗,不能客观地评分,这就助长了在教学中排斥诗歌写作教学的不良风气。

第五,对诗歌本身定位的要求:认为诗歌应该肩负起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

《诗道》提出:“新诗的定位是:引导社会文明和进步,重塑国民人格精神。”自周秦以来,这个定位一直就是诗歌的天职。一离开了这个天职,诗歌就会失去光彩和活力,被社会淡忘,被人们遗忘。如今诗歌被冷落的原因,与诗歌本身远离生活、远离实际有关。因此,作者呼吁:“新诗应该讴歌理想,歌唱我们伟大的事业,歌唱美好的生活,引导社会文明和进步。”“新诗应该在净化世风,提升人民精神境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了解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愿望,时刻牢记“两为”、“双百”方针,再现时代的精神,为社会的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广东一位诗人熊鉴先生说得好:“不与人民同甘苦,休遣风骚做诗人。”《诗道》说:

我们的新诗应该能够代表时代的先进文化,努力塑造新世纪的美好形象,使诗歌成为激励大众奋发向上的精神文化。同时,对于阴暗和丑恶必须加以暴露,使新诗在劝善和惩恶两方面都发挥作用。

综观陆凌霄同志的《诗道》,前半部对中国诗歌的本质特征、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主流意识和最高境界、诗坛领袖对于诗歌发展的作用及诗歌发展的主要原因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可以说这是对中国诗歌发展历程所做的有意义的总结工作。后

半部对当前诗歌教学的缺位,新诗品位下降的原因等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卓识远见。《诗道》是一个时代诗风转换的记录,填补了当前诗论的空缺。它对当前新诗坛的发展和诗歌教学的提高都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4年5月6日

SHI DAO

诗道

8

自序

这部《诗道》，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撰写这本书的动机，是想通过考察我国诗歌长期以来能够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经验，反思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纠正的办法，因为到了20世纪末，我国诗歌发展的方向似乎已经迷失，诗歌赖以发展的基础似乎也从根本上动摇了。

我国诗歌有着非常悠久的发展历史。从尧舜时代开始，就有《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帝载歌》这类歌谣的记载，并明确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诗学观点。西周时期，执政者出于陈诗观政和宫廷娱乐的需要，从诸侯国及民间收集诗歌，加上贵族和宫廷制作的雅诗与颂诗，由此产生了一部全面记载我国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的不朽的诗集——《诗经》。战国后期，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南方诗歌文化——楚辞的产生，又翻开了我国诗歌光辉的一页。汉武帝时期，汉赋勃兴，带动了诗歌的发展，五七言乐府和文人诗歌相继兴起，经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而不衰，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20世纪初以来，白话诗兴起，我国诗歌又呈现繁荣景象。四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我国的主流文学，得到了从社会最上层到普通百姓的喜爱，拥有众多的诗人群体和最广大的读者群，中国诗歌的独特的抒情性和优雅的表达方式，也造就了一个富有诗性的中华民族。我国的诗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诗歌传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诗歌艺术经验,如何继承这一传统和经验,走出我国的诗歌创作的新路子,是诗学界一直在关注的问题。

总结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创作经验,反思目前的新诗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之所以做这样的研究,首先基于对诗歌的兴趣和它对人类精神巨大影响的深切体验,深感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诗歌,特别是不能缺少具有高昂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的新诗,新诗的衰退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我生长在桂西南一个盛行山歌的小圩镇里。每当赶集,四周的村民“一路山歌一路来,见面对歌笑颜开”,“今天赶街忘买卖,先跟妹你对歌来”,这种情景,至今仍然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我家住在西街头,门前有一小块平地,外边是茂密的月季花墙,花墙之外是池塘和田野,这是歌手云集的地方。每到三、八月歌圩,我家和邻居的阳台上总有歌手在彻夜对歌,在我的耳畔,从小就回荡着具有乡土情调的悠扬的山歌声,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9年夏天,《刘三姐》歌剧响遍了每一个乡村,那时正处在刮“共产风”之后的饥荒之中,《刘三姐》的歌声使我们忘掉了饥饿和忧伤。那时候尽管物质匮乏,人们的精神却相当的富有。在受本民族山歌文化熏陶的同时,我也受到汉民族的诗歌文化的浸润。在读一年级的时候,课文里有一首叫《人民公社是金桥》的诗,诗中写道:“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合作化是银桥,人多车多不坚牢。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还有一首叫《我就是玉皇》,写得很有气势:“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些诗歌生动形象,含义深刻,几十年来,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三年级时,我从我哥的书架上拿到一本叫《文学》的课本,蓝皮封面,第一篇就是《诗经·君子于役》,